

从“兼济天下”到“人类命运共同体”

——儒学视域下新型文明观的构建

邓玉琼

(中共中央党校 文史部, 北京 100091)

[摘要] 从传统的“兼济天下”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华文明在新时代的涅槃重生。“天下观”是具有鲜明中国风格和中国智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超越“国家”,体现真正的人性;超越冲突,包容异质文明;超越私利,提倡大同世界,为新型的文明观贡献了中国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既源自于传统文明的深厚滋养,也应对了当前国际新环境和新问题的出现,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总体趋势。作为一种新的理念的提出,需要获得多方面的认同和遵循,必须建立一整套价值原则,其中多元一体是基本准则、互学互鉴是关键环节,共建共享是核心要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华文明必将在扬弃中获得新生,在吐故纳新、博采众长中焕发活力,也必将为世界新型文明秩序和文明观的构建注入中国元素。

[关键词] 天下;人类命运共同体;儒家;文明观

[中图分类号] B222;B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973(2017)05-0031-07

进入新世纪以来,全球化问题和人类发展前景日益变得突出和紧迫。中共18大以来,习近平主席从博大深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广泛汲取精神营养和治国理政的智慧,对外提出了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倡议,推动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积极引领21世纪新型文明观。这一理念充分体现了扎根于中华文明深厚土壤中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以儒学为主的中华文明对世界的态度不仅是个人对他人、对所处社群的态度,还将之外延为对待外部世界的认知方式与交往形式,其中“天下”观念是其典型的话语体系,认为文化高于种族、天下高于国家、大同是世界理想。儒家的“天下”观念在历史上曾建构了中华文明的共同体认同,在当前国际局势和世界潮流的新形势下,也将为全人类的利益共享、合作共赢、命运共通贡献具有中国智慧的新型文明观。

一、宣德怀柔的儒家“天下观”

“天下”这一概念一般认为是随着天帝由周人和殷人所敬拜的不同的神而融合成一个最高的神的产物。随着周朝的建立,周人视天帝为众神中的最高

神,拥有绝对权力,它普爱万民,降命于道德修养良好的人为天子以治理万民。因此,天帝作为最高神并成为了天地万物的主宰,在中国古人思想中形成了天下一家的思想。周代的统治崩溃以后,天与人的关系由原来的天与天子发生关系扩大为与所有人产生联络。人依据天的道德行事,天是人的价值规范和道德准则,天人合一的哲学范式由此得以展开。对于“天下”的概念,学者一般认为包含地理空间、政治空间、文化空间三种不同层面的意义。^[1]

在地理空间上,天下是“普天之下”的所有土地,没有界限,如《中庸》所解释的“天之所覆,地之所载”,郑玄解释“天下,谓外及四海也”。但周人认为虽然“天下”没有疆域的界限,却并不是均匀分布的,而是依照着一个由内及外,由核心到外围的差序格局进行布局,如《尚书·禹贡》中所描述的“九州”和“五服”制度,“芒芒禹迹,画为九州”,这九个州覆盖了华夏地域的所有部分。在“九州”划定后,又列“五服”于后,“五服”以京师为中心,向四面每五百里为一“服”区。《周礼》的“畿服”理论更是发展了《禹贡》的“五服”理论,即以地理位置的远近来安排中心与周边地区的亲疏关系,以及由此形成周边对中心的义务。由中心向外

[收稿日期] 2017-05-11

[作者简介] 邓玉琼(1981—),女,贵州思南人,中央党校文史部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儒家哲学、东西文化哲学比较。

不断扩展,由近及远,构成了古代中国治理的同心圆结构,也形成了古代中国人的一种差序的世界秩序格局,奠定了古代中国对周边国家的朝贡和册封体系,这种体系中,对外关系以“礼制”为主,天子不贪慕其他国家的财富。

政治空间和文化空间是地理空间的延伸,政治空间是古代中国天子权力统治和支配的范围,用以处理中国内部的政治管理和政治秩序。地理环境的同心圆和政治统治上的权力支配需要最终落实到文化价值上的吸引和归附。在这一“天下一体”的文化空间内,它以中原文化为中心,以夷、蛮、戎、狄分居东南西北的格局,强调以中华文化为价值体认为中心的同心圆世界,并向外部世界不断辐射,包含了中国关于世界结构秩序的想象和对外部世界的认知方式和处事态度。在文化空间中,以道德的感化和民心的臣服为凭借,因而可以无限延展其空间的容量和范围,所谓“得天下”不是获得了多少土地,而是说获取了多少民心,获得了多少文化价值认同,正如荀子所言:“取天下者,非负其土地而从之之谓也,道足以壹人而已也。”在这一共同的文化认同中,敌人可以化解为伙伴,竞争可以转化为合作,逐利可以转变为共赢,以达至“协和万邦”的理想。由此可见,古代的“天下”并非是实体概念,更多的是一种观念的建构和文化的想象。它表达了古代中国人对于世界秩序的构想和处理方式,通过价值观的辐射而获得广泛的文化认同,最终使王朝统治长治久安。“天下”概念虽然着眼于一种理想性世界的建构,但依然是服务于现实政治制度。

早在西周时期,“天下观”就蕴涵了以礼仪文明来处理对外关系的原则。在《左传·襄公十一年》中谈到:“夫乐以安德,义以处之,礼以行之,信以守之,仁以厉之,而后可以殿邦国,同福禄,来远人,所谓乐也。”《周礼·春官宗伯》“以和邦国,以谐万民,以安宾客,以说来人”。在古代中国的观念中,用一种道德的软性力量来使周边国家归顺或臣服,进而实现与周边的永久和平相处状态,是中国独有的一种文明交往准则,但这也蕴涵了古代“夷夏”之辨的中华文化中心主义思想,即以中原文化为中心,其他外族文明皆以此为圆心对此加以膜拜和朝贡。然而,我们也要认识到,这个文化中心主义并非一种孤傲和排挤他人,更不会对其他不同文明破坏和清除,而是在一个“天下”内,彼此尊重,相互依存。这是一种以“天下”为担当的美好乌托邦情怀,并在实际政治操作层面坚持奉行睦邻、友好、和平、安定的对外交往准则。

孔子继承了西周的文治教化路径,确立起了中华文明的对内对外核心准则,即以礼治—德治为中心,突显礼仪文明和道德教化的重要性,这是“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由内及外的展现,对内文治教化,对外怀柔远夷,以道德的吸引来增进与外邦的睦邻友好、安定协作。如《论语·季氏》言:“夫如是,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既用文明教化吸引远人,以提升中华文明的吸引力,又要加以安抚,使之进入文化同心圆结构,以达到永世安宁、和平共处的目的。

孟子也主张邻国之间要和睦相处,归附于仁德,反对以强欺弱,以大欺小。他曾批评白圭治水筑堤,“以邻国为壑”,是损害别国利益的“仁人之所恶”的可耻行径。孟子认为邻国应礼仪相处,和睦相安,国君在国内施行仁政,膏泽于民,就能使别国百姓产生对仁政的归附,“天下之民皆引领而望之”,如此就能统一天下了。

再如《礼记·中庸》言:“送往迎来,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远人也。继绝世,举废国,治乱持危,朝聘以时,厚往以薄来,所以怀诸侯也。”对待外邦要采取一种软性的力量,而不能诉诸暴力和武装,这样自然让外邦和远人心悦诚服,达到“柔远人则四方归之,怀诸侯则天下畏之”的效果。

“宣德化以柔远人”的对外观念自西周得以奠基,并在其后 2000 多年历史长河中深刻影响了中华民族文明的选择以及对外政策的制定。中华文明在当时算得上是先进而强势的文明,并一度引领世界文明的发展趋势,但却没有生发出残暴和野蛮的侵略行径,反而昌明富而不骄、强而好礼的德行,强不胁弱、强不欺弱、强不称霸、强而行德是中国人看重的文明方式,也是秉持的对待外部世界的态度。儒家的对外政策不主张扩土拓边,不掠夺领国物质财富,不侵占周边土地资源,一直以安边为本,睦邻为贵,这种兼济天下的王道思想与近代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达尔文进化论和霸权主义的西方思想截然不同。近代以来的国际准则,以民族国家的利益至上为核心原则,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以及海外市场的开拓,促使向他国输出资本和武力,也输出贫穷和战乱,为了自己的发展,不惜以他国的落后和牺牲为代价,甚至将其他弱小国家纳入自己的殖民体系,以使自己获得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近代以来的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民饱尝战争的苦难和贫穷落后的惨况,并日益感到脱离于世界体系和经济潮流的疏离和陌生。如何将这穷哥们共同带入良性发展轨道,应成为国际社会的共同责任。从历

史深处走来的儒家的“天下”担当意识和宣德怀柔的对外原则如何参与依然是以国家利益为核心诉求的国际秩序,中华文明的传统价值观如何在返本中获得全新的生命力,既是理论方面需要亟待解决的问题,也在实践中能发挥对于现实政治的制度设计的影响。

二、儒家“天下观”的新时代价值意蕴

“天下观”在古代很好地处理了中原文化与周边文化、中华民族与不同族群的关系准则问题,并维系了中国传统社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和平安定的稳定局面。近代以来,随着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入侵,传统的“天下观”分崩离析,取而代之的是以自由民主、开放竞争、民族国家、国家利益等为核心话语体系的近代世界文明格局与秩序。西方文明主导的世界秩序在面对新世纪以来所出现的人类文明问题开始显得力不从心,如何构建当代世界新秩序,共同参与新型文明观的建设,儒家的思想是否具有理论上的优势,值得深入思索和研究。

1. “天下观”超越“民族国家”,体现真正人性

“天下”是一个高于“国家”的存在。在秦朝以前,天下作为周王朝的代名词,是高于诸侯国的概念,“天下”代表比“国”高一级的统一性的价值,到了战国时代,随着诸侯国的分裂,周的这种高于“国”的天下一统性渐渐流为一种形式上的统一,然而,高于“国”的天下观念依然影响后世的政治制度。孔子时代礼崩乐坏,但孔子仍坚持“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周天子仍然作为天下一统的领袖。孟子时代,士的政治视野始终不局限在诸侯国内,而是以王天下为终极目标,推行其王道政治。《大学》所提出的君子修身八条目,也在“治国”之上,还有“平天下”的更高远追求。在儒家经典中,“天下”始终是高于、大于“国家”的一个概念,人们的政治意识不会止于“国家”层面。“国家并不是最高的概念,这已经成为中国人的天下观和世界观。”^[2]

这种独特的世界观也与近代西方的“国家”概念相去甚远,它更意味着一种对于自身、家族、种族、国家等束缚的超越,是一种人性的真正实现。正如杜维明所言:“当自我克服了利己心而成为真正人性的,家族也必须克服裙带关系而成为真正人性的。以此类推,社群也必须克服地方主义、国家必须克服种族主义、天下必须克服人类中心主义,而成为真正人性的。”^[3]“天下观”的核心,如前已经论证的不是地理空间意义上的疆域领土,而是以此为基础,对自然实体的超越,对个人利益、集团利益和国家利益的超越,最终指向的是关于人的生存与发展的核心命题,是让

每一个生命个体获得人性的尊严和价值,从而实现人性的解放和超越。这种世界观顺应生命进化及文化演进的规律,让人真正成为文化的核心,成为天下的主人,使真正人性得以确立和阐扬。而基于国家利益、丛林法则,弱肉强食等价值而形成的近代西方文明观,在当今全球性问题、全人类问题日益突出的情况下不仅无益于问题的解决,反而造成了现代文明的危机,如人性异化、道德滑坡、理想丧失、价值虚无等现代文明问题。这非但不是对于人性的弘扬,以及人的价值的确立,反而是对于启蒙以来所倡导的人性解放的背离。

中华的文明是否可以完全解决西方文明的问题,当然不能这么乐观地下结论,但至少我们应该看到,中华文明可以参与对话,并积极调适和纠偏西方文明发展中出现的弊病。中西文明始终需要一种互补共存的姿态,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共同为人类文明作出贡献,而不是一方消解一方,或取代一方,这在近代以来的中西文明深度交往和解除中,已然达成基本共识。西方的文明观认为理性至上、利益优先,强调国家间的竞争,遵循社会达尔文主义。而儒家的“天下观”是对现代性概念“竞争”、“利益至上”的观念的校正,超越民族国家的狭隘利益之争,使利益相关者和竞争对手变成可以共存和依赖的伙伴,共同走向“天下大同”的理想社会。这是基于普遍人性的立场,以实现个体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为依归,充分体现了儒家“天下观”的新型文明的价值意蕴,对于处理和应对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提供了中国智慧和方案。

2. “天下观”超越文化冲突,包容异质文明

西方的文明从自由和个体出发,除了建立以民族国家利益为核心诉求的社会秩序外,另外很重要的就是建立了以宗教的方式来进行社会管理的文明秩序。西方文明中的基督教为民众确立了个体、集团、社会的法则,在不同历史阶段力求与世俗政权结合,做到政教合一。基督教在确立精神皈依和世俗秩序合一时,强调信仰的独一无二性,视其他教派为异端,往往激化成剧烈的宗教冲突和社会动荡。赵汀阳认为基督教对于西方的影响在于把分裂的世界概念带进西方思想,“它剥夺了关于人间世界的完美和永恒理想的想象权利,并把那些权利都归给了天堂世界,于是世界就仅仅是个科学问题,而生活就变成信仰问题,所谓世界观就停留在自然的世界观上,而未发展出人文的世界观。”^[4]基督教的这种分裂式的理解世界的方式成为后世战争、冲突、迫害、征服的思想源泉。尤其是近代以

来,随着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扩张,基督教教义也得到了广泛的传播,然而非西方地区的人民并没有普遍接受其宗教思想,反而引发了各地一系列的复归传统的文化保守主义热潮。有些地方甚至发生了激烈的宗教冲突并引发战争,给地方经济发展和文明繁荣进步造成巨大阻碍。

而儒家的“天下观”认为中国是天下一家的帝国,天子以天下为家,普天之下都是自己的子民,因而产生“无外”原则,这种观念使中国很难产生像西方排除“异端”的思想,同样也不会产生像西方那样的界限分明,你争我夺的民族主义。正如赵汀阳所言的,中国的天下观所代表的哲学是以整个饱满的或者完备的世界作为背景和坐标去思考问题,虽然这种天下观意味着有以自己为中心的地方主义,但不会有截然不共戴天的他者(the others)或者异端意识。^[5] 尽管,中国历史上也出现过清除“异端”的“排佛”运动,但是由于中华文明所具有的巨大包容性,最终佛教文明这个迥异于中华文明的异质文化被中华文明所融合,并产生了中国式的佛教——禅宗。

在儒家的天下一家的观念中,所有的其他地方都是天下内部,家庭内部事务没有绝对的纷争,在一个大家庭的内部事务中,所有问题都可以协商得以妥善解决。这种整体论下的世界观,不仅保证了世界的一体性,也充分保证了文明的多样性,对于异质文明,始终是包容差异,和谐共生,而非主客对立的二元分裂思维方式。理论上的“天下无外”原则超越了宗教冲突和民族利益纷争的模式,但在实践上,我们仍要清醒理性看到,人性的自私原则,地方主义的普遍性,文化保护主义的抬头等,使得天下原则不能完全克服不同文明交流中所引发的冲突和碰撞,而且随着全球化的深入,这种文化的冲突还将日益明显。然而,我们却不能妄言天下原则的过于理想化而不切实际,它至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调和不同文明体之间的矛盾,并以一种最大的包容性对各种不同文明秉持一种尊重和欣赏的眼光,让各个国家共同参与全球文明体系的构建。正如21世纪初兴起的以“过程哲学”(process philosophy)为基础的“建构性后现代主义”提出的“第二次启蒙”口号——“关心他者”、“尊重差异”,^[6] 他们认为,当用自身的“自由”专权削弱共同体时,其结果一定会削弱其自身的“自由”,因此,必须拒绝抽象的自由,走向有责任的深度自由。而真正的深度的自由正是以关怀他人,尊重差异,相互欣赏为基础的。因此,儒家的“天下”观正是这样一种基于真正人性上的包容差异性原则的文明新思维方式,

对于西方的二元思维方式是有力的回击。

3. “天下观”超越一己私利,倡导大同理想

“天下观”的最高理想是大同世界,大同的世界是互助友爱、安居乐业、社会平等、国际和平的世界,社会共同发展、世界和谐相处,这是儒家所期望的完美的人类社会境界,是对于个人私利、家族利益、集团利益、国家利益超越后所达至的一种最高愿景。儒家典籍《礼记·礼运》篇对大同理想有详尽描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少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大同社会,是孔子认为尧舜时期也没有达到的“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至善境界,包含了儒家对于理想社会的设计。在大同理想中,“天下为公”为总体纲目,从人才选拔、内外关系准则、社会保障、劳动方式等方面阐述了大同社会的具体落实。这是古代中国人对理想社会的描述,希冀一个和谐美满、各司其职、各尽其力,没有困苦和争斗、没有剥削和压迫的理想世界。

尽管,这种理想蓝图在古代并没有得以实现,只是作为一种“境界性”的制度存在,但是却成为了一种批判现实,制衡权力的理论武器和力量。这种天下观念的批判性力量一直被嵌入古代政治的制度设计中,即使是在朝贡和宾礼制度等这些似乎是中华中心论制度设计中也没有完全消失。^[7] 因此,天下大同的理想蓝图更多是从一种高远的境界的宽阔的视野来把握人类整体命运。干春松将儒家的制度设计分为“境界性制度”和“现实性制度”,认为后者是对前者的自我放逐和退化,由于“现实性制度”建立在“力量”和“利益”的考量上,而缺乏纯粹性和绝对性原则,因此要反思其合理性。这种反思可以保持对于现实性制度的批判和审视,使其向“境界性”制度的回归。^[8] 因此,大同理想能否实现,并不是关键问题,而其重要意义在于一种对于现实社会的反思批判力量,也让我们知道现实离理想到底有多远。儒家的“天下观”在古代没有得以落实,在当前以民族国家的利益格局为基本秩序的国际关系中,“天下观”依然有实践方面的困难,但是并不能因此而放弃对于高远境界的追求,也不能放松对于现实的理性反思,反之,正是因为我们共同面临着日益严峻的现实性问题,才激发我们去思考超越利益、超越竞争的一种绝对性、纯粹性的高远境界,并从中获得批判现实的力量,以让人类能更好

把握复杂多变的未来。

“天下观”深深镌刻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渗透着中华文明的价值原则，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第三次集体学习时所指出的，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的滋养。在这一理念所滋养下所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正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的最新呈现，是中华文明在现代社会作出的积极贡献，也是中华文明的涅槃重生，必将给世界贡献一种新型的文明观。

三、继承与超越：

天下观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从十八大报告中提出这一概念以来，“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在一系列重要国际场合被进一步阐释，其重要性不言而喻。2017年2月10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中，体现了这一理念的普适性原则，并不断被人们认可和接受，可以说，这一概念符合人类发展的总体趋势，彰显了中国对全球治理所贡献的东方智慧和文明新主张。“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既是对古代中国“天下”观的继承，同时也是对其的超越和发展，它批判吸收儒家“天下主义”的协和万邦思想和天下大同理想，自觉摒弃了传统的“华夏中心主义”的思想。“人类命运共同体”从传统的整体观念出发，以多元一体为基本准则，以互学互鉴为关键环节，以共建共享为核心要义，鲜明体现了中华文明的智慧，同时也彰显了时代所赋予的新内涵。

1. 以多元一体为基本准则

“共同体”概念本身包含着不同族群、不同文明形态的共同存在状态，文化的多样性促使文化的繁荣和文明的交流成为可能，“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在不同文明的深度接触和广泛交流的前提下，人类的文明才能走向兴盛和昌明。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世界各地文明的蓬勃发展，不是用一种文化取代另一种文化，也不是将异质文明同化于自己文明之中，尊重差异，也包容差异，强调多元共生，但这些差异性和多样性，也统摄于一个大的文明框架内，即人类的共同发展和前途命运。在共同的前提和基础下，各自使自己的文明得以充分发展，使对话和交流成为可能。这种反对西方的一元论，认为多样性的统一是繁盛发展的根本思想，是一种真正的中国智慧。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必须以人类各个不同文明的发展为前提和基本准则，只有各个

文明都能繁荣发展，才能为全人类的文明作出一己贡献，才能在共同的“体”中把握自己和人类的前途和命运。因此，共同体概念不是像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入侵其他文明体一样，要将其同化、消解、进而虚无、置换，使其他民族地区变成文化殖民地，而自己的民族文化支离破碎，更不是将文明的冲突上升为宗教冲突进而引发战争和无止境的争斗，这一概念是在尊重差异，包容“异端”，鼓励各自民族文化独立发展，在共同的文明进步和文化发展中取得人类命运的共同发展。这一准则既尊重世界差异性，又注重世界统一性，克服了西方中心论，历史终结论，应对了世界发展趋势，也回应了当前发展问题，是一种新型的文明视野。

2. 以互学互鉴为关键环节

天下观念中，各个族群的和谐相处，与邻为善，协和万邦，以追求和平安定为终极目的，而如今，世界各地的文明交流日益频繁，文化的对话亟待进行，传统社会的讲信修睦，万国咸宁的各自为安、相安无事是远远不够的。现代的文明更需要不同文化之间的积极对话、坦诚交流，尊重彼此的文明，同时又能充分汲取别人所长来发展自己，关起门来做天朝上国的美梦是行不通的。互相学习，取长补短，才能使自己获得更大发展，互相交流借鉴，扬长避短，才能使自己更加走向自信和自强。罗素在《中西文明的对比》中说：“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在过去已经多次证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希腊学习埃及，罗马借鉴希腊，阿拉伯参照罗马帝国，中世纪的欧洲又模仿阿拉伯，而文艺复兴时期的则仿效拜占庭帝国。”^[9]到了17、18世纪，欧洲又曾吸收印度文化和中国文化，从而获得了强大的生命力。而中国也是不断吸收外来文化而获得发展的自东汉时印度佛教的传入，经过魏晋南北朝的广泛发展，在唐代一度出现了文明交流融合的顶级盛宴，它也成为宋明理学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之后佛教经中国传入朝鲜半岛和日本，而且又与当地的文化相结合形成具有当地特色的佛教。明末时期传入的西方文明，虽然是一种侵略性的文化，但在刺激中华文明获得新生的同时，也在客观上促进中西文明之间更深入和广泛的交流。西方开始向东方寻求可持续发展之道，东方也开始走向理性启蒙、科学理性的现代文明之路。文明在现今深度接触的背景下，更加需要各个不同文明体之间的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共同进步。

3. 以共建共享为核心要义

以民族国家的利益为核心准绳的现代国际秩

序,照顾到了本国利益的最大化,应对了一个独立主权国家的合理化诉求,回应了民族的核心关切,可以说在历史上曾起到了积极的正向作用,并使国家迅速走向富裕和强大。然而,进入新世纪,这种民族国家的利益之争变成了零和博弈,变成了一种有你没我,有我没你的力量搏斗,甚至变成了不惜以牺牲他国利益来发展自己的狭隘和偏执。各个国家各自为战,与邻为壑,甚至扬言“某国优先”,与全球化和人类共同命运背道而驰。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在追求本国利益的同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进一步而言,就是要摒弃零和游戏,你输我赢、你死我活、赢者通吃的旧思维,树立共同发展的新理念,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指出的,零和思维已经过时,必须走出一条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新路子。各国和各国人民都应该共同享受发展的成果,只有各国共同发展了,世界才能更好发展。那种以邻为壑,转嫁危机,损人利己的做法已经不具备合理性和可持续性。因此,树立命运共同体思维,就是要在在共同利益下共商共建,合作共赢,共享人类文明的发展成果,使普天之下的人们都有获得感、满足感、获得感。

四、结语

从古代的“兼济天下”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过度,彰显了在全球化时代如何更加立体和多元地解决人类所面临的共同问题,既符合从历史深处走来的儒家素朴的理想愿景,也切近当前挑战层出不穷、挑战日益增多的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着眼于人类文明的永续持存性发展,超越狭隘的民族国家视角,调和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冲突和对立,追求人类共同的价值观,是全球治理的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的核心理念。“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必须形成造福于全人类的共同价值理念,使得世界各地的人们“命运相连、休戚与共”,不仅要在物质层面相互依存,更要在精神层面求同存异,塑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人类新身份,建设一种更加适应全球化语境的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文明新视野和新格局。试图把自己孤立起来,以自我为中心,只顾自己,不顾他人的发展模式不具备可行性,以“天下”为己任,兼济世界各地人们的胸怀,在一个“命运共同体”内实现共赢共享不仅呼应了世界的脉动,也展现了大国的担当,体

现了鲜明的中国特色。这种应对全球问题的中国方案在国际范围内可以增强的我国理论话语权,并更加自信地参与国际秩序的重构。

世界秩序的重构趋势必然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从产生于国家之间的国际秩序,到体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之间关系的世界秩序,再到突显人类和地球之间关系的全球秩序,这种秩序体系呈现出逐渐递进的态势。全球秩序超越国界、种族、民族,是全体人类都必将面对的现实问题,如生态环境问题、能源问题、人口问题、核武器问题、公共卫生问题、跨国犯罪等等,这些问题都难以在民族国家的范围内得以合理解决。因此,对这些关切人类共同命运的问题必须确立起超越国家利益的世界眼光,必须把个体、民族、国家的发展放置于整个人类生存发展的境遇下,使各个国家间形成一种休戚与共、荣辱相关、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相互关系,并结合成一个紧密的命运共同体,同呼吸、共命运,那才能确立起合理的、可持续发展的全球治理新秩序。

总之,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的提出,是中华文明在新时代的涅槃重生,它跳出了“华夏中心论”和“西方中心论”,辩证扬弃中华传统文明,超越西方文明,为人类和世界发展贡献了一种中华新文明,并为世界构建了一种新型的文明观。中华新文明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博采众长,并吐故纳新,是引导世界发展走向,全球化发展趋势,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

[参 考 文 献]

- [1] 陈来. 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国学流变与传统价值观[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64.
- [2] 赵汀阳. 天下体系[M].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44.
- [3] 杜维明. 儒教[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127.
- [4] 赵汀阳. 天下体系:帝国与世界制度[J]. 世界哲学,2003,(5):8.
- [5] 赵汀阳. 天下体系:帝国与世界制度[J]. 世界哲学,2003,(5):8.
- [6] 汤一介. 在儒学中寻找智慧[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211.
- [7] 千春松. 儒学概论[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249.
- [8] 千春松. 世界和谐之愿景:《中庸》与儒家的“天下”观念[J]. 学术月刊,2008(9):54.
- [9] 罗素. 中国问题[M]. 上海:学林出版社,1996:146.

(责任编辑:谢光前)

From "the Simultaneous Economy to the World" to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Construction of New Civilization Concep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fucianism

DENG Yu-qiong

(Ministry of Culture and Politics, CPC Central Committee, Beijing 100091, China)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from "the simultaneous economy to the world" to "the community of human destiny" can be counted as the rebirth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in the new era. The concept of World is a world outlook and methodology with distinctive Chinese style and Chinese wisdom, which transcended the State and reflected the true human nature; besides, it also transcended conflicts and tolerated heterogeneous civilizations, transcended private interests and advocated the world of great harmony, contributing a Chinese program to the new concept of civilization. In line with the general trend of human society development, the proposition of the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not only originates from the deep nourishment of traditional civilization, but also meets the emergence of new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and new problems. As a new concept, it needs to be recognized and followed, and a set of value principles must be set up. So, pluralistic unity is the basic criterion, mutual learning and mutual learning is the key link, and sharing and construction is the core. Under the new historical conditions,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 will certainly be reborn in the process of sublation, will coruscate in the course of getting rid of the stale and taking in the fresh, and will finally inject Chinese elements into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concept and order of world civilization.

Key words: World;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Confucian School; Concept of Civilization

(上接第 30 页)

To Strengthen the Moral Conception of History ——from Zi Zhi Tong Jian (History as a Mirror) to Zi Zhi Tong Jian Compendium

LIU Rong

(School of Marxism, Hefei Polytechnic University, Hefei 230009, China)

Abstract: Confucian law and ethics and the dominant power for the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ical events can be frequently found in Zi Zhi Tong Jian. Sima Guang explained the history and architec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fucian ethics, so the historical view of morality is the exact historical view in the book. In essence, such a historical view of morality still serves for the ultimate writing purpose of the rule of governance. As an adaptation for Zi Zhi Tong Jian, Zi Zhi Tong Jian Compendium has an increasingly strengthened moral outlook, which has further evolved into the justice conception of history. In the social field, the essential standard of justice is the feudal tsunatsune moral law. Therefore, justice has been regarded as the supreme truth and eternal law of human society. In Zi Zhi Tong Jian Compendium, Zhuxi counted this form of justice as the interpretation of all the history basis and program, so history is the history of the shadow of justice. In fact, the book is an example that Zhu Xi's philosophy is exerted in the history of justice in practice. Through the trend of strengthening the moral history of China in the two dynasties, the gradual rise and flourishing of Neo-Confucianism in Song dynasty can be clearly found

Key words: Moral Conception of History; Justice Conception of History; Zi Zhi Tong Jian (History as a Mirror); Zi Zhi Tong Jian Compendium; Confucian School of Idealist Philosophy